



Zhongguo Lishi
Wenhua Dajiangtang
Wenbo Xilie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 • 文博系列

刘毅 总主编

中国 古代佛教文物

隋璐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ZHONGGUO GUDAIFOJIAO WENWU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

刘毅 总主编

中国古代佛教文物

隋璐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佛教文物 / 隋璐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7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

ISBN 978-7-310-03443-7

I. ①中… II. ①隋… III. ①佛教—历史文物—简介—中国 IV. ①K87②B9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1798 号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2 插页 350 千字

定价: 26.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总 序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第一批推出《中国古代陶瓷器》、《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紫砂器》、《中国古代佛教文物》、《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古代陵墓》，共八种。它们是关于上述诸门类文物及文化遗产的概述性著作，大都是以各位作者各自的授课讲义为基础整理修订而成，其基本属性是大学本科专业教材。

南开历史学科有重视教材建设的优良传统。积极倡导创办博物馆学专业的郑天挺教授曾经在 1960 年代初担任全国文科教材历史组的主要负责人，主持史学教材选编工作；本专业的首任主任王玉哲教授不仅有专著《中国上古史》传世，还在 1980 年代末组织骨干教师编写了国内第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教材——《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在国内各高校文博考古专业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教材编纂的耗时费力是有经历者所共知的。一部好的教材，应该高屋建瓴，具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合理的编排结构；对于原始数据的利用，应该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以清晰合理的思路来统帅编排，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行文要符合教材的特点，深入浅出，并尽量适应读者群的需要；还特别要注意学术观点的普适性（不一定是作者本人或作者所赞同的），而很多涉及的问题也不能深入展开，只宜点到为止；一些新兴的学科门类或分支的教材，还具有很强的原创性，与专著几无差异。同样地，一部好的教材，应该是进入不同学科领域的最佳引路者，有些不但能使读者得其门径，还可能使之受益终身；教材的编纂，能够不断促进教学内容的更新，使课程体系乃至整个专业的学科体系进一步完善；教材建设是学科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之一，也是专业建设水平的重要标志。

南开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科发端于 1960 年代初，1979 年 9 月重新组建博物馆学专业，隶属于历史系。1980 年秋季开始面向全国招收本科生，是全国同类专业中创办最早的。专业创办之初，在课程设置、讲授内容等方面均无成宪可循，文物考古类课程则先后聘请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现天津博物馆）等单位的有关专家讲授。到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本系教师已经相继自己开设出“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中国考古学通论”、“中国古代青铜器”、“中国古代玉器”、“中国古代陶瓷器”等课程，它们以及稍后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研究”、“中国古代佛教文物”、“中国古代书画”、“中国古代建筑”等，有不少在高校相同或相近专业中都属首

创。今年是南开大学文博专业正式创办 30 周年，通过 30 年间几代教师的不懈努力，文博类课已经在南开大学栽植成功，师资队伍建设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受中国文物研究传统的影响和中国博物馆发展现状的制约，文物考古类课程在各高校文博专业课程中都占有很大比重，南开大学文博专业也不例外。这类课程一直是我们的教学重点，讲义等基本教学数据也最为完整。这套《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虽然不完全是教材，但它们毕竟是以讲义为基础编纂而成，其突出特点是知识体系完备，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时下坊间有关文物考古鉴赏类、知识普及类图书不少，但精品不多。教材比专门考古报告的不同之处，是它的全面性和突出重点、简明扼要；而比普及信息类书籍的不同之处，是其科学严谨，在资料翔实可靠、准确深刻等方面，更为一般介绍性著述所无可比拟。

《中国历史文化大讲堂·文博系列》的构想最初由莫建来先生提出，后经反复协调筹划，决定由我组织先期编纂第一辑八册，作者以本系教师为主，也有现在其他单位工作的原本系博士生和研究生。希望这八册只是一个开端，这套丛书今后能够继续编辑出版；其内容将不再局限于不同门类的文物，形式也将不仅局限于教材；除本系教师以外，作者还将逐渐扩大到其他曾经在南开文博系（专业）工作过和学习过的人，以及所有南开文博的有缘者。

刘 毅

2010 年 1 月 1 日

目 录

第一章 石窟寺	1
第一节 概 述.....	1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	5
第三节 隋唐时期.....	30
第四节 五代、宋元时期.....	44
本章小结.....	56
第二章 单体像及造像碑	57
第一节 概 述.....	57
第二节 汉至三国时期.....	65
第三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	68
第四节 隋唐、五代时期.....	82
第五节 宋、辽、金时期.....	91
第六节 元、明、清时期.....	97
本章小结.....	105
第三章 塔及经幢	107
第一节 概 述.....	107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塔.....	115
第三节 隋唐、五代时期的塔.....	121
第四节 宋、辽、金时期的塔.....	128
第五节 元、明、清时期的塔.....	138
第六节 经幢.....	146
本章小结.....	154
第四章 法 器	156
第一节 概 述.....	156

第二节 僧服	170
第三节 净瓶	174
第四节 锡杖	180
第五节 炉具	184
第六节 梵钟	190
本章小结	195
附录一 插图目录及引用来源表	197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203
后记	214

第一章 石窟寺

第一节 概述

一、中国石窟寺的产生与发展

石窟寺是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来源于古印度，在佛教创立之前已经出现，佛教借鉴了这种形式，石窟寺也伴随佛教的发展与传播渐次流行。在佛教发源地印度和佛教早期传播地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都保留了许多坐禅、礼佛的石窟遗迹，著名的有孟买东南的卡尔利石窟及温迪亚山中的阿旃陀石窟等。古印度的石窟寺主要包括“支提”与“精舍”两类^①。“支提”多呈马蹄形平面，前部空间供僧众集合，其功能类似佛寺中的讲堂；后部半圆形空间的中心位置安置舍利塔，僧众可绕塔礼佛。“精舍”又称“毗诃罗”，一般平面方形，窟室后壁安置舍利塔，或设讲堂，窟壁上常常凿出数个小窟，此类石窟可供说法、礼佛及居住使用。石窟寺作为佛教寺院的特殊类型，也具有一般寺院的功能，因而在许多石窟中，不同功能的洞窟往往组合在一起，构成功能完整的组合。

中国的石窟寺约发端于3世纪，盛行于5至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②，延续时间长，数量多，分布广，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具有很高的历史及艺术价值。

佛教东传经由中亚，翻越葱岭，首先进入新疆地区。这一地区的石窟寺作为佛教及佛教艺术的重要载体，影响了中原地区石窟的开凿。新疆地区主要流行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及禅窟。中心柱窟仿照以塔为中心的塔庙式佛寺布局，可供佛教信徒右旋绕塔礼拜供养，基本保持了窟室后部马蹄形平面，上覆穹窿顶的古印度特征。“毗诃罗”式禅窟及僧房窟可供僧人禅修、居住，反映了佛教初传时，小乘佛教的盛行。除僧房窟外，窟内都绘有壁画，绝大部分原置塑像，6世纪以前，塑绘内容多表现释迦、交脚弥勒和佛传、本生、因缘故事等小乘佛教题材。

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连年战乱，社会动荡，这就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进入河西走廊时首先于敦煌汇集，受到东西方文化的交互影响，河西地区于4世纪后期至5世纪初期开始了石窟寺的营建活动，以凉州（今甘肃武威）为中心，由北凉时期的武威天梯山石窟、西秦时期的永靖炳灵寺石窟以及张掖金塔寺、马蹄寺石窟、酒泉

① 罗哲文，王振复：《中国建筑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25页。

② 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文殊山石窟等共同构成了河西石窟的独特风貌，在洞窟形制、塑绘题材与风格等方面主要受到西域的影响，被称为“凉州模式”^①。

南北朝时期，凿建石窟之风已遍及中国西部及中原地区，从地理分布上看，西起新疆，东至山东，南至浙江，北至辽宁，都有石窟寺存留至今，从而形成了中国石窟寺开凿的第一个高潮。5 世纪前期，北魏统一了中原北方地区，在北凉佛教的影响下，于北魏文成帝复法以后，由昙曜主持开凿了著名的云冈石窟。北魏迁都前，平城（今大同）一直是中原北方石窟开凿的中心地区，其洞窟形制、造像式样及题材等共同构成了“云冈模式”^②。洞窟形制主要有大像窟、中心塔柱窟、方形或长方形佛殿窟、禅窟等。早期开凿的洞窟还不够成熟，稍后的二期洞窟则更加符合中国传统规范。中国早期石窟多由禅僧开凿，地点一般选择依山傍水、环境幽静、远离城市之所，开凿的目的多与修禅有关，坐禅必须先于石窟中观像，入定后方可见“佛影”，因此，早期石窟基本按照禅观的要求雕塑或绘画佛像。除禅观之外，修功德及保存经像也是佛教徒开窟造像的重要目的，这种通过建造佛像做功德的行为从禅僧迅速扩展到广大僧俗信徒，云冈、龙门石窟中就有许多带有题记的中小型窟龕，至隋唐时期，石窟寺已成为礼佛的重要场所，修禅的功能逐渐淡化。这一时期，在玄学的影响下，中原地区的佛教更倾向于大乘佛学，因而塑绘题材主要表现《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典内容^③。云冈石窟艺术以石刻造像为主，早期造像明显受到印度健陀罗、笈多风格的影响，带有较多外来因素。北魏时期，云冈周围还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平顺宝岩寺石窟，向东有宣化下花园石窟、济南千佛山石窟、徐州云龙山石窟，最远端达辽宁义县万佛堂石窟，这些石窟寺的开凿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云冈模式”的影响。

5 世纪末，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开始营建龙门石窟，早期开凿的古阳洞、宾阳洞等都继承了云冈昙曜五窟的风格。太和改制以后，南方佛像的式样与风格，如螺发、褒衣博带式佛装、悬裳式衣摆、秀骨清像等逐渐影响到龙门石窟，并延续至东、西魏时期，其洞窟形制与云冈相比趋于简化，本土化及模拟寺院殿堂建制的特征更加显著，龙门石窟的开凿也带动了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巩义石窟、偃师水泉石窟、渑池鸿庆寺等石窟寺的营建。

6 世纪前期，北朝统治中心转移到了邺城及长安附近，东部地区形成以邺城和晋阳为中心的新石窟群，其中响堂山石窟和天龙山石窟最具代表性。西部地区的石窟寺基本上没有受到朝代更迭的影响，在原有地点继续开凿。这一时期的窟龕形制、造像式样具有上承北魏，下启隋唐的过渡特征。

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手工业渐渐独立，佛教在理论上有了新的突破，统治者对于佛教也基本采取了支持态度，中国的佛教进入了极盛期。唐以前开凿的新疆库木吐喇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天水麦积山、永靖炳灵寺石窟、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等在隋唐时期续有建造，一些石窟寺更在此期达到鼎盛。唐代新开凿的石窟主要集中在陕西地区及南方地区，如陕西的彬县大佛寺、麟游慈善寺，四川的广元千佛崖及皇泽寺石窟、巴中石窟、安岳石窟等。隋唐时期的石窟寺不仅分布范围大大扩展，数量大增，石窟艺术更是大放异彩。洞窟类型丰富，空间宽敞，随着大乘佛教的流行及佛教寺庙的本土化，佛殿窟逐渐取代了戒行礼拜所需的中心塔柱窟和修禅的毗诃罗窟成为主流，

① 宿白：《凉州石窟遗迹与“凉州模式”》，《考古学报》1986 年第 4 期。

② 宿白：《平城实力的集聚力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114 页。

③ 闫文儒：《中国石窟艺术总论》，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年，第 63 页。

模仿木构佛殿的特点日益显著,并出现了佛殿中心设坛的佛坛窟。窟前接建木构堂阁的摩崖龕像也十分盛行,这种依山镌像、露顶开龕的做法主要受到了南方影响^①。这一时期,随着佛教诸多宗教派别,如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密宗等的渐渐形成,反映这些信仰的塑绘内容更为复杂。随着佛教的逐步社会化,出现了“俗讲”、“变文”等艺术形式,经变画在石窟壁画中逐渐流行,特别是唐代巨幅净土变壁画所处的地位逐步上升。与之相应的,弥勒、阿弥陀等反映净土信仰的造像日益增多,甚至成为主尊中的大宗^②。此外,观音信仰在民间也拥有了深厚的基础。受到南朝齐梁时期张僧繇画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造像注重表现体积感和肌肉质感,形成了丰腴健美的风格。

中晚唐时期,中原地区经历了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社会经济文化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再加上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抑制了佛教的发展,其它宗派渐趋衰落,而禅宗得以存留并继续发展,密宗则盛行于西南、西北、东南等地,中国石窟寺的开凿中心转移到政治、经济相对稳定,文化较为发达的四川地区,这一地区的石窟寺也由北部向中、南部扩展。五代时期,中原北方地区朝代更迭频繁,后周世宗的灭法运动,更使北方佛教深受打击,伴随着佛教的世俗化发展以及木构寺院建筑的日趋成熟,石窟寺呈现出衰落的态势。这一时期营建或续建的石窟寺减少,主要集中在政局相对稳定的南方及西北地区,有吐鲁番伯孜克里克石窟、敦煌莫高窟、四川大足石窟、杭州西湖沿岸的石窟寺以及云南剑川石钟山石窟等。在洞窟形制方面,出现了背屏式佛坛窟,南方地区仍流行凿建摩崖龕像。塑绘题材中,观音、地藏、天王、文殊像比重增加,反映了观音信仰及密宗的盛行。

宋、辽、夏、金、元各代,石窟开凿地点减少,但在陕西延安地区、浙江杭州地区、四川大足地区、云南大理地区及西藏地区等还有规模较大的开窟(龕)造像活动,罗汉群像、藏传密宗题材增多,体现出禅宗的壮大及藏传佛教流行。由于儒释道三教的逐渐融合,石窟造像中还出现三教杂糅的题材以及与佛教无关的石窟寺,如山东益都云门山的陈抟洞、河北北响堂山的岳飞洞、山西太原天龙山的全真道教石窟等等。明清时期也有小规模的开凿石窟寺、重塑或改塑造像等活动,但总体上,石窟寺已逐渐衰落而荒废了。

二、中国石窟分区

中国的石窟寺根据洞窟形制及主要造像差异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区域,即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和西藏地区^③。

新疆地区的石窟寺主要分布在自喀什向东的塔里木盆地北沿路线上,集中于三个区域:

(一)古龟兹区。即今库车、拜城一带,位于新疆中部,北倚天山,南对昆仑,西通疏勒,东接焉耆,隔一沙漠与于阗接壤,为丝路北道的要冲,物产丰饶,不仅民族文化发达,而且与内地往来密切,佛教最为兴盛,主要石窟寺有拜城境内的克孜尔石窟,库车境内的克孜尔尕哈石窟、库木吐喇石窟和森木塞姆石窟等。这一地区的石窟寺分布集中,洞窟数量多,规模较大,延续时间较长,在吸收外来文化、融汇民族形式的基础上,至3、4世纪形成了自身特色,并直接影响了龟兹以东的广大地区。(二)古焉耆区。在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区七格星一带,石窟寺主要有位于焉耆西约40公里的七格星石窟。(三)古高昌区。在新疆吐鲁番附近,

① 宿白:《南朝龕像遗迹初探》,《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

② 李涛:《佛教与佛教艺术》,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212页。

③ 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7页。

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门户，古为“车师前部”，西汉时以“高昌壁”得名，是汉文化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地点，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今吐鲁番县城东南的哈拉和卓附近，即高昌故城。保存了一些佛教寺塔遗迹和石窟寺，有开凿较早的吐峪沟石窟，规模较大的伯孜克里克石窟，以及拜西哈尔石窟、奇康湖石窟、胜金口石窟、雅尔湖石窟等。在新疆地区的石窟寺中，克孜尔石窟规模最大，开凿最早，大约开凿于3世纪，兴盛于4至5世纪。其它两区的石窟寺开凿时间略晚，约在5世纪，最晚的洞窟可能延续到13世纪。

中原北方地区指新疆以东、淮河流域以北，以迄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的石窟寺数量多，内容复杂，发展脉络比较清晰，是中国石窟寺的主要组成部分，又可细分为四区：

（一）河西区。主要分布于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镇附近。河西走廊是中西交通的枢纽，同时也是佛教及佛教艺术东传的重要纽带。敦煌东连走廊，西通葱岭，雄踞玉门关和阳关，汇集丝绸之路的南北两道。敦煌一带的石窟群有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东千佛洞等，其中建窟最早，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莫高窟。酒泉附近有玉门昌马石窟和文殊山石窟，张掖地区有肃南金塔寺石窟和武威天梯山石窟等。这些石窟寺，除榆林窟、东千佛洞的开凿年代较晚之外，大都保存着5至6世纪的遗迹。武威天梯山石窟有可能是历史上著名的凉州石窟遗迹。（二）甘宁黄河以东区。主要石窟寺有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庆阳平定川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泾川王母宫石窟及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等，分布范围较广。永靖、天水石窟始凿于5世纪，固原、庆阳石窟寺的始凿年代略晚，炳灵寺石窟第169窟无量寿佛龕还有西秦时期的纪年题记，这是中国现存窟龕中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的一处。（三）陕西区。这一地区是研究中国北方晚期石窟的重要地区。石窟寺分布分散，每个地点的洞窟数量不多，主要集中于西安附近和陕北地区，有彬县大佛寺、麟游慈善寺、耀县药王山、富县石泓寺、黄陵万佛寺、延安万佛洞、子长钟山石窟、志丹城台石窟等，开凿年代较晚，多数石窟开凿于6世纪以后，少数窟龕早至6世纪，7世纪石窟开凿的地点增多，如彬县大佛寺石窟、耀县药王山等，11至13世纪是陕北地区营建石窟的盛期，此外，这一地区还有许多佛道混合洞窟，其中开凿于西魏大统元年（535年）的洞窟中出现了佛像及老君像，为目前发现最早的佛道合开洞窟。（四）晋豫及其以东区。这一地区是北方政治、经济以及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遗迹数量多，创始时间较早，出现了许多由皇室显要开凿的石窟寺，汇集了全国的财力、人才、优秀工匠，构成了中国石窟寺的主流，并对于周边地区以及其它区域的石窟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充分表现了佛教石窟逐步东方化的具体过程，在全国的石窟寺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一地区的石窟寺主要有5至6世纪北魏皇室开凿的大同云冈石窟、鹿野苑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巩义石窟，6至7世纪开凿的邯郸响堂山石窟和太原天龙山石窟等。此外，5至6世纪开凿的义县万佛堂石窟、浍池鸿庆寺石窟、济南黄花岗石窟，7世纪初开凿的安阳宝山石窟等也都与上述主流石窟有着密切关系。此区开凿较晚的石窟寺还有6至8世纪开凿的益都云门山石窟、驼山石窟，11世纪开凿的内蒙古巴林左旗洞山石窟、前后昭庙石窟，13至14世纪开凿的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以及15至16世纪开凿的平顺宝岩寺石窟等。

南方地区主要指淮河以南地区。这一地区的摩崖龕像多于洞窟，布局分散，主要集中于江南、四川和云南等地。年代较早的石窟寺有开凿于5至6世纪的南京栖霞山龕像、新昌剡溪石城摩崖龕像以及6世纪开凿的广元皇泽寺和千佛崖石窟。隋唐时期，两京地区与益州的交往更为频繁，四川地区石窟开凿的范围及规模都有所扩大。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玄、

僖二宗被迫逃蜀，同时，官吏、士人、僧人、工匠等也纷纷入川，西南地区成为了唐王朝的大后方及晚期石窟开凿的重要地区，营建的石窟主要有巴中石窟、安岳石窟等。除此之外，年代较晚的石窟还有10至14世纪开凿的杭州西湖沿岸窟龕，9至13世纪开凿的剑川石钟山石窟等等，石窟艺术异彩纷呈，体现出浓厚的区域文化特色和宗教特质。

西藏地区的石窟大都开凿于10世纪以后，即藏传佛教所谓的“后弘期”，是中国晚期石窟寺的主要区域之一，分布范围较广，题材有释迦、弥勒、千佛、十一面观音和各种护法形象，并多附刻六字真言。拉萨、日喀则、山南、林芝、昌都等地以摩崖龕像为主^①，造像表面多有艳丽的绘彩装饰。西部阿里地区以四壁满绘佛像的佛殿窟为主，还有禅窟和僧房窟等，拉萨药王山东麓的札拉鲁浦石窟，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洞窟^②。

这四个地区的石窟寺，各具特点及发展规律，但又相互影响。从总体上看，5世纪晚期以前，中原北方的石窟艺术主要受到新疆的影响，这显然与佛教艺术自西向东传播的情况有关；5世纪晚期以来，佛教艺术在新疆以东逐渐形成自己的特点后，中国各地石窟龕像的发展演变，尽管都还保留着地方特征，但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全国重要的政治中心或文化中心所盛行佛教艺术的影响。

第二节 两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南北朝时期，开窟造像之风逐渐兴盛，石窟寺数量较多，主要集中在北方，包括新疆地区的克孜尔石窟、库木吐喇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尕哈石窟；河西地区的敦煌莫高窟、武威天梯山石窟、玉门昌马石窟、张掖金塔寺及马蹄寺石窟，酒泉文殊山石窟；甘宁黄河以东地区的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固原须弥山石窟、庆阳南北石窟寺；晋豫及以东区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义石窟、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宝山灵泉寺石窟、安阳小南海石窟等，南方以营建木构佛寺为主，开凿的少量窟龕有南京栖霞山石窟、剡溪石城山石窟等，与秦地联系密切的西南地区川北广元在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千佛崖和皇泽寺石窟的营建。

这一阶段的洞窟形制主要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禅窟、瘞窟、方形三壁设坛或三壁开龕窟以及少量的敞口大龕。洞窟形制及布局除表现地方特色之外，也具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如：以克孜尔石窟为代表的中心柱窟，窟内中心柱平面方形、正面开一龕，带有前、后室，河西地区早期石窟寺在此基础上发展为四面分层开龕，每层上宽下窄，有些带前室，云冈石窟的中心柱也是四面分层开龕，但在形态上更接近木构楼阁式塔。云冈早期凿建的昙曜五窟吸收了西域及河西地区大像窟的因素，而南方地区敞口大龕又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新疆地区窟顶中部的天象图及莲花设计也影响了中原地区的莫高窟、云冈、龙门等石窟寺的窟顶布置。各式禅窟的出现反映了这一时期，特别是北魏及以前“凿仙窟以居禅”风气及禅学的盛行。“毗诃罗”式禅窟最具代表性，在石窟的中央设方形或长方形的讲堂，左右两侧开凿很多小型石室，每室仅容一人坐禅。就整体发展趋势而言，模仿木构佛殿的特点是渐趋鲜

① 陈建彬：《西藏摩崖造像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

② 宿白：《中国石窟寺考古》，《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明的。北魏中晚期出现诸如平基藻井仿木构窟檐等木结构特征，莫高窟还流行仿木人字披顶，佛龕除了圆拱龕、尖拱龕外，还有结构复杂、装饰精美的屋形龕、帐形龕等。东西魏、北齐周时期，模仿帐架结构的覆斗顶窟逐渐占据了主流地位，延续时间较长。麦积山西魏、北周窟中还出现了大型的崖阁式窟，与前代相比，更加忠实于木构殿堂式样，响堂山北齐窟也有类似的前廊后室结构的大窟，并在前廊上部崖面雕出覆钵式塔顶，形成了独特的塔形窟。

塑绘题材，早期以释迦为主，佛传、本生、因缘题材占有突出地位，还包括交脚弥勒、佛装弥勒、思惟菩萨等，反映了小乘佛教信仰的盛行。北魏中期以后，小乘题材虽然也占有一定比重，但三世佛、千佛等大乘题材已居主导地位，这些题材不断丰富，主要包括释迦、弥勒、释迦多宝、维摩文殊、无量寿、西方三圣、阿弥陀、七佛、乘象普贤、护法像等，还出现大型礼佛行列以及众多的供养人像。造像从早期的单身像到一佛二菩萨三尊像组合，至北魏中晚期发展为一铺五身像和一铺七身像组合形式。塑绘的佛及菩萨式样同样体现了本土化的发展趋势，北魏晚期的造像从服饰到面相已完全表现为风神飘逸的中国士大夫形貌，而造像式样上第二次大的转化发生在北齐、周时期，造像身躯壮硕，衣纹浅疏，为隋唐时期成熟的写实风格奠定了基础。

一、新疆地区

1. 克孜尔石窟

克孜尔石窟位于拜城克孜尔镇东南约 10 公里的戈壁悬崖上，东距库车约 21 公里。在龟兹地区的石窟寺中，克孜尔石窟开凿较早，规模较大，类型齐备，保存相对完整，整个石窟群依自然地势可划分为谷西区、谷内区、谷东区和后山区，已编号的洞窟达 236 个^①，其中 70 余个洞窟形制较完整，其开凿年代无明确记载，从遗存情况看，多数洞窟建于 4 至 7 世纪，9 世纪以后逐渐衰落，伴随着伊斯兰教的盛行，洞窟全面废弃。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于各国探险队的掠夺、盗割，克孜尔石窟的壁画、塑像及其它文物蒙受了一场惨痛的劫难。

根据洞窟形制、组合；壁画内容、风格；洞窟本身改建及相互打破关系，并参照 C¹⁴测定部分洞窟的年代，可大致可将克孜尔石窟分作三期，第一期约在 4 世纪初至 4 世纪中期，第二期约在 4 世纪后期至 6 世纪前期，第三期约在 6 世纪中期到 7 世纪后期。前两期属于早期石窟，第二期是克孜尔石窟开凿的盛期，第三期为克孜尔石窟的衰落阶段^②。

克孜尔早期石窟的形制主要包括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及方形窟四类。中心柱窟平面呈纵长方形，一般由主室、后室和中心柱三部分构成，少数洞窟带有前室，但多已崩毁。主室多为纵券顶，高敞明亮，后室低窄阴暗，前部正中设有直通窟顶的中心塔柱，略呈方形，正面开一大龕，龕中塑佛像。龕左右开甬道，与后部隧道相连形成右旋礼拜道。这种窟形在印度支提窟的基础上，又融入了龟兹地方特色，被称之为“龟兹式”，可减少因地质疏松所造成的洞窟塌毁。有些中心柱窟的后室后壁凿出涅槃台，其上绘塑涅槃像。大像窟（图 1-1）也属中心柱窟的一种，或者说由中心柱窟衍生出来，一般无前室，只有主室、后室和中心柱三部分，后室空间扩大，比主室略宽，中心柱前壁塑出半浮雕式大立佛，佛像下部左、右、后方开礼拜甬道。僧房窟（图 1-2）一般设有门道和主室，门道为长条形，平顶或券顶，主

① 马世长：《拜城克孜尔石窟》，《中国佛教石窟考古文集》，新竹：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2001 年，第 11 页。

② 宿白：《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35 页。

室方形、券顶，内设炕及壁炉等。有的洞窟在门道后壁设方形券顶小室，有短甬道与主室相通，有的则带前室。主室前壁中部开窗，小室口和主室口原装木门。有些僧房窟为单独开凿的小窟，其内多无塑像、壁画，为佛教徒入塔观像、坐禅而兴建。方形窟一般带有前室，但多崩毁，主室方形或横长方形，前壁正中开门，或一侧开门，另一侧开窗，有些洞窟的主室正中砌佛坛，坛上原置塑像，有些则可能为讲堂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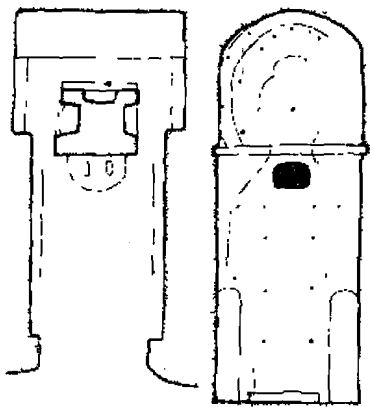


图 1-1 克孜尔第 47 窟（大像窟）
平面及主室正壁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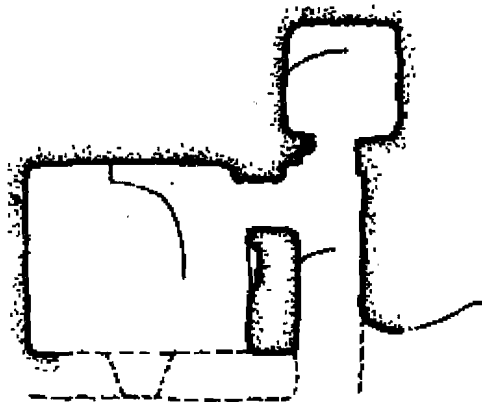


图 1-2 克孜尔第 6 窟（僧房窟）平面图

第一期洞窟主要分布在谷西区，洞窟类型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及僧房窟等。僧房窟数量较多，各类洞窟间的组合关系不明显。窟内绘塑题材以释迦为主，壁画主要表现释迦牟尼修行、教化、说法的本生、因缘和佛传故事。第二期洞窟数量较多，分布于克孜尔石窟的各区内，洞窟类型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僧房窟及方形窟等。方形窟在第一阶段已初见端倪，此期数量很多。各类洞窟间出现了明显的组合关系，如方形窟与中心柱窟或僧房窟的组合；中心柱窟、僧房窟及方形窟三者的组合等^②。中心柱窟中出现相互毗邻，带有共同前室或棧道，形制、布局及题材相近的成组双窟，其开凿年代应较为接近^③，除前段流行的主室窄于后室或与后室等宽的情况之外，主室宽于后室的窟形比较普遍。洞窟形制、壁画题材等更加多样化，后期改变前期窟形的情况也比较常见。这一时期的绘塑内容，除延续上期流行的释迦、交脚弥勒及表现释迦本生、佛传、因缘故事之外，还出现千佛及卢舍那佛形象，反映了这一地区大乘佛教的逐渐流行^④。

克孜尔石窟的塑像均遭毁坏，但壁画保存较多，代表了其石窟艺术的主要成就，大量表现释迦牟尼修行、教化、说法的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画占有突出地位，反映了“唯礼释迦，无十方佛”的小乘佛教思想，与龟兹地区小乘信仰的盛行密切相关，同时也是内地早期石窟出现本生题材壁画、雕塑的重要渊源。目前已辨识的本生故事画有 70 余种，如睺子本生、鹿王本生、尸毗王本生、月光王本生等，佛传故事 60 余种，以反映涅槃内容为多，因缘故事

① 宿白：《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28 页。

② 宿白：《新疆拜城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 年，第 26 页。

③ 任继愈：《中国佛教史（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656 页。

④ 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35 页。

40 余种,如波罗奈人身贸供养缘、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等题材^①。壁画布局层次分明,如中心柱窟中,主室前壁窟口上方绘交脚弥勒兜率天说法图(图 1-3),后壁龕外绘菱格山峦或听法菩萨、伎乐。左右壁不分栏或分上下栏,各栏绘二至三铺因缘、佛传故事,近顶处绘天宫伎乐。窟顶壁画分为三部分,券顶中脊处绘天象图,包括日神、月神、风神、立佛、双头金翅鸟等。中脊左右两边绘以菱格山峦为背景的本生故事,或本生、因缘、佛传故事相间布置,每一菱格中各绘一幅内容不同的本生或因缘故事画。左、右甬道亦绘故事画。后室前壁多绘焚棺或舍利塔,左右壁绘舍利塔或立佛,后壁绘释迦涅槃及举哀图,顶部绘菱格山峦。中心塔柱前部表现释迦在深山讲述自己前生施舍和现世教化的事迹,后壁多表现释迦涅槃、焚棺、分舍利的情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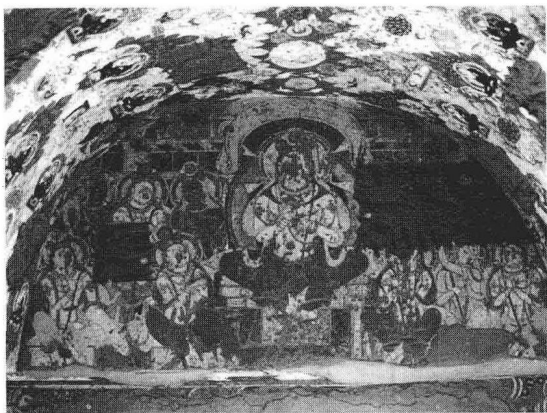


图 1-3 克孜尔第 38 窟前壁弥勒菩萨

克孜尔石窟壁画以西域的凹凸晕染法驰名中外,立体感极强,主要用于表现头面手足等肌肤部分,这种绘画手法出现于克孜尔石窟的各个阶段,延续时间很长。墨线勾勒刚劲有力,由粗变细,吸收了中原传统的“屈铁盘丝”线描技法,又能与立体烘染效果相协调,壁画颜色主要有红、绿、蓝、白、黑等,以红、绿、蓝三色为主,红色已多变成黑色或棕色,色彩深重,对比鲜明。壁画中人物形象及服饰或具有印度人特征,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身着龟兹装的人物小眼、圆脸,口鼻集中于面部中央,其画法对于敦煌北魏窟有重要影响。以菱格形式排列的佛本生、因缘、供养故事画和富于装饰性的大色块对比为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又一特色,构图不同于敦煌石窟的连环画式,而是抓住具有典型性的瞬间来刻画形象,以单幅形式表现一个完整的情节,风格粗简而生动。克孜尔石窟壁画中的山、水、树等富于装饰性,树木或作矛头形、蝶形,或形如一只手掌,稍晚出现三、五片花瓣式的树顶。此外,还保留了大量龟兹乐舞形象,其裸体人像艺术也是中国内地少见的,受印度早期佛教影响,代表了中国古代人体艺术的辉煌成就。

2. 库木吐喇石窟

库木吐喇石窟位于库车县西南约 30 公里处,石窟附近发现了不少唐及唐以前的军事设施遗址,如玉曲吐尔遗址、夏克吐尔城堡、库木吐尔城堡等^②。库木吐喇石窟分为南北两区,相距约 3 公里,共有洞窟 112 个,散布在渭干河东岸的山麓和断崖上。南区编号洞窟 32 个,洞窟形制及壁画保存较好者不足 10 个;北区洞窟较为集中,已编号者达 80 个,保存较完好的近半数。20 世纪初,日、德、俄、法等国的探险队在掠夺、破坏克孜尔石窟的同时,也染指库木吐喇石窟^③。石窟的始凿年代没有确切的文字记载,塑像基本损毁,判断洞窟开凿年代主要依据壁画内容、技法以及窟内题记。目前多将库木吐喇石窟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年代约在 5 至 7 世纪,为龟兹时期,洞窟的形制、组合及壁画的布局、题材、人物形象、

① 朱英荣,韩翔:《龟兹石窟》,新疆大学出版社,1996 年,第 54 页。

② 苏北海:《丝绸之路与龟兹历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444 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年,第 262 页。

绘画技法等均与克孜尔中期洞窟十分相似,具有显著的龟兹风格;中期年代约在8至9世纪,为唐代汉族政权统治时期,石窟艺术吸收了中原佛教艺术风格,体现出两种文化的交融、渗透,这一时期也是库木吐喇石窟的盛期;晚期年代约在10至11世纪,为回鹘高昌统治时期,虽有一些重要遗存,但已进入衰落期。

库木吐喇石窟的洞窟形制主要有中心柱窟、大像窟及方形窟三种。中心柱窟一般由前室、主室、中心柱和后室组成,平面作长方形,主室多为纵券顶,正壁两侧凿有通道分别连接后室或后甬道,中心柱正面开一大龕,一些洞窟的中心柱四壁各开一龕。大像窟或设有中心柱,在中心柱前壁塑大立佛,左、右、后三面设甬道,后室左、右、后三壁设像台或涅槃台;或不设中心柱,佛像依崖壁塑造。方形窟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一般有前室和主室,纵券顶、穹窿顶或覆斗式顶,一些方形窟正中设像台,原塑佛像。依据洞窟使用功能可分为佛堂、讲堂、影堂、僧房及其它辅助性洞窟,其中佛堂最多,尤以“五佛堂”的形制最典型^①。在壁画题材方面,库木吐喇早期洞窟多表现日天、月天、金翅鸟、立佛等组成的天象图以及菱格式的佛本生、因缘故事画等,方形窟顶部多绘有莲花及分隔成条幅状的立佛、菩萨七至十一身(图1-4),侧壁绘佛传故事,壁画的布局、题材、风格与克孜尔第二期洞窟壁画十分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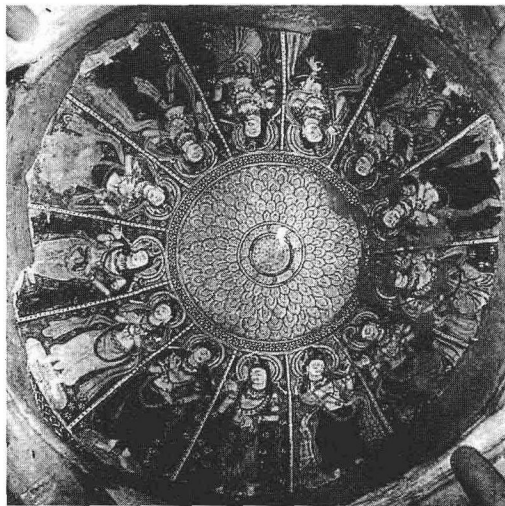


图1-4 库木吐喇新2窟主室顶部

3. 森木塞姆石窟

森木塞姆石窟位于新疆库车县克内什村西北,距县城30余公里,是古龟兹东部最大的一处石窟群,现存绝大部分洞窟的前段已塌毁,塑像没能留存下来。带编号的洞窟有52个,其中保存原窟体二分之一以上的有19窟,在直径约800米的范围内分成东、南、西、北、中5区,中区有面积达1.5万平方米的寺院建筑遗址^②,形成地面寺院与石窟寺的有机组合。洞窟类型主要包括礼拜窟(佛堂)、讲堂窟、禅窟和僧房窟,以礼拜窟为主,僧房窟数量少,这种情况与克孜尔等其它龟兹石窟不同,与森木塞姆石窟的特殊布局相关,中区的地面寺院建筑代替了僧房窟作为起居和修禅的场所,因此环绕中区的石窟寺主要作为礼拜窟^③。在礼拜窟中,中心柱窟数量最多,其次为大像窟。中心柱窟通常由前室、主室、中心柱和礼拜道组成,早期窟顶多为纵券顶,晚期的个别窟出现穹窿顶,中心柱有正壁开一龕或四壁各开一龕两种情况。较大的礼拜窟多将礼拜道中段扩展为后室。

森木塞姆石窟的建造与龟兹国王提倡佛教有关,壁画和塑像带有龟兹艺术风格,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亚和印度的影响。人物画用土红色线勾勒轮廓,其间平涂填色,用晕

① 杨永生:《中外名建筑鉴赏》,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1页。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第431页。

③ 李裕群:《古代石窟》,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染法表现明暗与立体。壁画题材以小乘佛教题材为主,大约至6世纪以后出现中原地区流行的大乘佛教题材,反映出中原佛教及文化艺术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4. 克孜尔尕哈石窟

克孜尔尕哈石窟位于库车县西北12公里处的东西两崖上,现有编号的洞窟46个,保存较好的38个,其中近一半为僧房窟,一半为中心柱窟,第24窟形制特殊,为七角形平顶中心柱窟,这是龟兹石窟群中所仅有的。克孜尔尕哈石窟洞窟组合现象明显,基本具备了礼拜、讲经、坐禅和居住的完整功能。从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来看,开凿年代与克孜尔石窟和库木吐喇石窟基本同时^①。残存壁画的洞窟仅11个,以佛本生、因缘故事为主要题材,部分洞窟保存了大量龟兹国王及其家族的供养像,被考古学家推断为龟兹王室功德窟^②。

二、河西地区

1. 敦煌莫高窟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鸣沙山东麓,洞窟上下分层排布,多者可达五层,根据洞窟分布情况,可分为南、北两区,两区的使用功能不同,南区是莫高窟的精华所在,主要作为佛殿和礼佛的场所,北区则是供僧众生活、居住、习禅及瘞埋的区域^③。这里早在莫高窟创建以前,佛教就已传入并逐渐深入人心了,同时汉文化对于敦煌地区也有着较深的影响。莫高窟的始建年代说法不一,目前多依据武周圣历元年(698年)《李君莫高窟佛龕碑》的记载,认为其开凿于“初(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又《莫高窟记》云:乐僔“西游至此”;《李君碑》载:禅师法良“从东届此”,可知莫高窟在开凿之始就受到了东方文化因素的影响,这种因素主要来源于凉州佛教^④。碑文仅提到建造窟龕,没有涉及造像之事,故有学者推测其最早开凿的洞窟为禅窟。莫高窟现存洞窟492个,为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历代所建,前后延续一千年之久,是中国石窟发展的缩影,窟内保存了数量可观、内容丰富的建筑、壁画和彩塑,堪称中国佛教艺术宝库。

编号17窟的藏经洞位于第16窟甬道北壁,平面近方形,覆斗顶,规模较小,原为纪念洪(上巩下言)而凿建的影窟,开凿于吐蕃统治时期^⑤,其封闭年代基本在西夏占据瓜沙时期,或稍后的二三十年^⑥。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洞内所藏4至11世纪的2万多种卷子被偶然发现,英、法、美、俄、日等国的“探险家”闻风而至,劫掠了大量珍贵文物。藏经洞的发现及洞内文书的公布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对于敦煌的关注,从而产生了以研究藏经洞内遗物和莫高窟洞窟内容为主要对象的“敦煌学”。

莫高窟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即北朝时期,隋唐时期,五代、宋元时期。现存北朝时期洞窟36个,分属北魏、西魏和北周三个朝代。其中第268、272、275窟年代最早,三窟南北相邻,自成一组,位于南区中部,形制各不相同,第268窟为“毗诃罗式”禅窟,平面纵长方形,平顶,南北两侧各有两个小禅室,后壁龕内为单身交脚佛(图1-5);第272

① 常书鸿:《新疆石窟艺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② 邹卓然,刘松柏:《库车——龟兹佛韵 乐都风情》,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8页。

③ 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④ 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中国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15页。

⑤ 马世长:《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12期。

⑥ 阎文儒:《莫高窟的创建与藏经洞的开凿及其封闭》,《文物》1980年第6期。